

[Special Contributions]

From Literary Translation to Cultural Dialogue:
The Enduring Legacy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and Its Translator: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Zhu Zhenwu

¹²ZOU Ling ³ZHU Zhenwu

¹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ina

²Hun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China

³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Received: October 2, 2025

Accepted: October 15, 2025

Published: December 31, 2025

To cite this article: ZOU Ling & ZHU Zhenwu. (2025). From Literary Translation to Cultural Dialogue: The Enduring Legacy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and Its Translator: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Zhu Zhenwu.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5(4), 001–010, DOI: 10.53789/j.1653–0465.2025.0504.001. p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5.0504.001>. p

This article is supported by the Major Project of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Fund of China titled “History of African English Literature” (Project No. : 19ZDA296), and is also a phased achievement of the Major Project of Graduat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Reform Research in Chongqing Municipality entitled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ain Framework Standards for the Translation Practice Report of the Docto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DTI)” (Project No. : yjg250160).

Abstract: In this interview, Professor Zhu Zhenwu, serving as the chief expert of the national major project “History of Africa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the national key project “Strategies and Problems of Contemporary Sinologists’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to English”, carries out a comprehensive, incisive and profound exposition on three pivotal topics. These encompass “thoughts and reasons” behind the formulation of Chinese African-literature, the sharing of experiences regarding the “successes and challenges” encountered in translation practice alongside classic translation case studies, and a forward-looking perspective on the “innovation and advancement” of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in the era of AI-driven translation. During the interview, Professor Zhu also reflects on his intellectual journey in the realms of translating and introducing Chinese literature, conducting research on Africa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engaging in translation and teaching practices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He provides an exhaustive introduction to the self-constructed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studies on literature, translation and civilization mutual learning, including the “Chinese African-literature” and the “Balance of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principle that he has proposed. These distinctive insights mak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absorbing the core elements of foreign culture, facilitating the advancement of translation discipline, as well as promoting the prosperity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Keywords: Chinese African-literatology; Theories of Africanness; Literature Translation; AI Translation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s: ZOU Ling, Lecturer of Hun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is a Docto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DTI) student at the College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primarily focusing on the translation of social science literature. For academic inquiries or collaboration opportunity, please contact him via his email: zou2020ling@163.com.

Dr. ZHU Zhenwu, as a Professor, doctoral supervisor, postdoctoral cooperative supervisor of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in Shanghai, China, is the director of key national disciplin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member of the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senior translator in China, and senior visiting scholar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of Oxford, University of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and others.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and culture translation,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ture & culture as well as African literature. For academic inquiries or collaboration opportunity, please contact him via his email: fredzzw2002@163.com.

從文學翻譯到文化傳播：永恒的翻譯文學， 永恒的翻譯家！ ——朱振武教授訪談錄

^{1 2}鄒 令 ³朱振武

¹四川外國語大學；²湖南文理學院；³上海師範大學

摘 要：本次訪談，朱振武教授結合自身領銜主持的國家重大項目『非洲英語文學史』和國家重點項目『當代漢學家中國文學英譯的策略與問題』，圍繞以下三個話題，理論溯源——關於『中國非洲文學學』提出的『道與術』；實踐分享——關於翻譯實踐與經典案例的『得與失』；未來展望——關於學科發展與時代機遇的『破與立』，開展了全面、精辟、深邃的闡述。訪談中，朱教授還回顧了其從事中國文學譯介、非洲英語文學研究以及英美文學翻譯與教學實踐的心路歷程，詳細介紹了其構建的『中國非洲文學學』和『歸異平衡』理論等文學研究、翻譯研究和文明互鑒研究方面的自主知識體系理論。這些獨到的洞察與見解對吸收異域文化精華，促進我國翻譯學科建設和文學文化發展繁榮大有裨益。

關鍵詞：中國非洲文學學；『非洲性』理論；文學翻譯；人工智能翻譯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非洲英語文學史』（19ZDA296）；2025年重慶市研究生教育教學改革研究重大項目『翻譯博士專業學位（DTI）翻譯實踐報告主體框架標準構建研究』（yjg250160）。

鄒令（以下簡稱『鄒』）：朱教授您好，非常感謝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採訪！近期，有幸現場聆聽您作的題為《人工智能無法勝任的文學翻譯》專題講座，深受啟發。同時，我也關注到您的研究興趣涉及多個領域，特別是在文學創作、文學翻譯、文化翻譯、中外文學文化比較研究、非洲英語文學研究等方面都有自己獨到的洞

察與見解。今天,我想從三個方面對您做個專題訪談。

一、理論溯源:關於『中國非洲文學學』提出的『道與術』

鄒:近年來,您越來越多關注『非主流』文學研究,提出了讓學界耳目一新且富有中國特色的『中國非洲文學學』概念。2019年6月,您同時出版了《非洲英語文學研究》《非洲國別英語文學研究》和《非洲英語文學的源與流》三本佳作,堪稱國內對非洲文學研究與文化傳播的奠基之作。請問您是什麼時候開始把研究焦點從主流的英美文學研究轉移至『非主流』的非洲英語文學研究的?可以結合三本書簡單介紹下嗎?

朱振武(以下簡稱『朱』):謝謝你的提問。其實,十多年來我一直在思考主流之外的文學存在,包括它們的發生、發展、嬗變、影響以及美學表征、文化意蘊和藝術形態。你所提及的2019年同期出版的這三部著作,實際上是對既往『非主流』文學研究與非洲文學研究的一種歸納,均聚焦於非洲文學研究領域。《非洲英語文學研究》主要從宏觀維度對非洲文學展開研究,回溯非洲英語文學的發展歷程,呈現我國學者對非洲英語文學研究的基本狀況。《非洲國別英語文學研究》著重針對南非、尼日利亞和肯尼亞三個國家展開個案探究,旨在從微觀維度為讀者描繪出非洲文學的整體圖景。2019年我們選編這兩本書的初衷在於通過均衡吸收異域文化養分以滋養中華文明,在『一帶一路』倡議下促進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形成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非洲英語文學的源與流》乃中國專門探討非洲英語文學的源流嬗變的學術著作,從非洲英語文學的流散表征入手,系統研究了尼日利亞、南非、肯尼亞、津巴布韋等非洲主要英語國家文學的肇始、發展和勃興,詳細闡釋了非洲英語文學獨特的流散表征,深刻揭示了非洲殖民英語文學的創作傾向,並對非洲英語文學的文本、史料和批評話語進行整體觀照和跨界研究,為構建有中國靈魂的非洲研究、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話語體系起到了典範作用(朱振武,2020:73)。2024年,我們出版了十卷本的非洲文學研究叢書,通過田野調查搜集大量資料,對被邊緣化的一些非洲文學現象和史料再次進行了系統梳理,內容從區域、國別、流派等方面進行細化。

關於研究焦點從主流的英美文學研究向『非主流』非洲文學研究轉移的問題,可從兩次學術會議談起。2011年,我們舉辦了一場規模較大的學術會議——『新千年外國文學熱點研討會暨研究生外國文學教學走向與出路問題全國學術研討會』。在此次會議上,提出了『非主流』文學的概念,並將其與英美、歐美主流文學相提並論。事實上,諸多文學被歸為『非主流』的原因在於其在文化制度、政治地位和經濟實力方面均處於相對弱勢。2012年,我在上海大學專門舉辦了一場『英語文學高端論壇』研討會,特邀該研究領域30多位博導級知名學者。本次研討所涉及的英語文學主要指英美之外的文學,尤其是對『非主流』文學進行了系統探討。當時做出這一調整,是考慮到學界對英美、歐美等所謂主流文學的研究較為豐富,而對所謂『非主流』文學的研究則極為匱乏,了解程度極低,甚至近乎一無所知。這種狀況既不利於文化多樣性的發展,也不利於均衡汲取外國文學文化的精神內涵。

後來,我在接受《文匯讀書周報》專訪時提出了『均衡吸納說』,特別強調中國學者應該均衡吸納各國文學文化的精髓,多層攝取,廣泛吸收,增強對其他國家文學文化的關注和研究程度,才能更好地講述中國故事。英美國家研究者的聲音不代表我國學者的聲音,中國學者應立足於本土文學文化,增強文化自覺,發出自己的聲音,提出自己的看法。為此,我舉辦了一系列會議,推出了一系列著作和論文,均圍繞『非主流』英語文學研究和非洲文學研究展開探討,同時致力於引導學界朝此方向發展。

鄒:2021年10月,坦桑尼亞作家阿蔔杜勒拉克克·古爾納(Abdulrazak Gurnah)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成為第七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非洲作家。2021年『非洲文學年』的出現對您的研究內容和方向有哪些新的思考與啟發?



朱：『非洲文學年』這一說法由我率先在古爾納獲獎前提出，隨後一系列獎項的歸屬情況與我的觀點不謀而合。我始終堅守自身的研究方向，古爾納獲獎並非讓我們初次了解他，而是因為我們對他早有研究，媒體才會跟蹤我們並主動獲取相關信息。古爾納獲獎之初，中國媒體對他的了解幾乎為零，僅有上海外國語大學的查明建老師在多年前翻譯過他的兩篇短篇小說，且當時無人預料到他日後會獲獎，因此對其長篇作品毫無涉及，直至他獲獎後才出現一次性購買其十本長篇小說版權的情況。

2021 年被視為『非洲文學年』，是上一次非洲文學獲獎潮的歷史再現，是非洲文學的非洲性和包容性的顯性體現，也是歷史變革之下西方文明危機對人類文明新趨勢的渴望與呼喚（朱振武，2022：10）。可見，英國、美國等歐美地區將注意力投向了非洲，諾貝爾文學獎、布克獎、普利策獎、龔古爾文學獎等一系列獎項皆授予了非洲作家，甚至美國的本土獎項也連續多次頒給非洲作家。不難看出，在疫情肆虐的特殊時期，歐美國文化呈現出疲態，面對特殊情況應接不暇甚至應對乏力。回顧過往，每當諾貝爾文學獎授予非洲、亞洲或拉丁美洲作家時，背後往往隱藏著某種特殊目的和動機。我 2008 年在《當代外國文學》發表文章《多麗絲·萊辛：否定中前行》，分析了英國女作家多麗絲·萊辛（Doris Lessing）獲得 2007 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崎嶇之路，專門探討諾貝爾文學獎授獎理念嬗變的問題（朱振武、張秀麗，2008：96）。2021 年的『非洲文學年』並非使我的研究發生根本性改變，而是進一步增強了我在該領域研究的韌性與信心，讓我更加堅信研究方向的正確性和價值性。

鄒：『非主流』文學的研究範圍很廣，為何選擇聚焦『非洲英語文學』研究？非洲英語文學作為一個比較宏大的『學術研究群體』，不可能面面俱到，目前您的研究側重點主要聚焦於哪些國家或地區？

朱：非洲英語文學的版圖覆蓋整個非洲大陸的東部、西部、南部、北部和中部，其研究群體規模處於中等水平。2019 年，我獲批中國首個非洲文學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非洲英語文學史』，項目團隊不斷發展壯大至百餘人，但研究範圍仍難以做到全面覆蓋。究其原因，一方面受語言和區域因素的製約。非洲本土語言種類繁多，如阿拉伯語、豪薩語、索馬裏語、斯瓦希裏語、桑達韋語等，不同語言所承載的文學各有特色且研究難度大，這給全面研究帶來了極大挑戰。另一方面，研究人員精力有限。非洲文學研究不僅需要對語言有深入掌握，還要對相關國家的歷史、社會、宗教等知識有全面了解，難以對所有語言的文學進行系統研究。因此，研究工作著重聚焦於成果較為顯著、文學體量較大、作家數量較多且影響力較廣的區域，但研究關注點仍覆蓋整個非洲文學，而非局限於英語文學。

我們研究團隊也關注法語文學，同時對葡萄牙語文學也有所涉獵，這得益於團隊擁有一批專業學者，其中不乏熟悉非洲本土文化的專家，且與當地學者在該領域開展了合作。後續計劃將非洲本土語文學作品譯為漢語，同時將中國當代文學的精華部分向外譯介。翻譯語種不僅涵蓋英語、法語等通用語言，還將聚焦於非洲本土語言，此舉旨在強化我國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

鄒：朱教授，您首次提出了『四大流散』理論和『非洲性』理論，並將非洲作家總體劃分為四大類，即本土流散作家、異邦流散作家、殖民流散作家和異邦本土流散作家。相較於西方作家多關注自我的內心故事，非洲作家更喜歡講述關乎時代命運、具有家國情懷的外部故事（朱振武、李丹，2022：65）。可以談談您對『四大流散』理論和『非洲性』理論的獨到理解嗎？這背後有著怎樣的文化因素考量？

朱：這主要源於中國學者曾在一段時間內處於相對失語的狀態，而這種相對失語的原因在於，改革開放之後我國大量引進並吸收西方的理論以及各類文本觀點。我國始終強調文化自信與文化自覺，這實則有著深刻的道理。但自主知識體系建構和理論建構有所不足，其間甚至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溝壑或斷代，近兩年，國家提出了自主知識體系建構以及新質生產人力、新質文化生產力等概念。我提出的『四大流散』理論、非洲性理論、輾轉體認理論等，這些理論均可歸入中國非洲文學學的整體建構之中。我們能夠運用中國非洲文學學理論對包括澳大利亞、加拿大、印度、加勒比等處於非主流地區，尤其是全球南方國家和地區的文



學文化進行重新考察與界定,發掘其潛在價值,歸納其共性與亮點。如此,我們便能認識到,那些看似處於『非主流』狀態的文學文化並非真的不重要,而是與其他文學文化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2019年7月,我在《中國社會科學》第七期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流散文學的時代表征及其世界意義——以非洲英語文學為例》的文章,此文闡釋了該怎樣研究非洲文學,什麼是非洲文學(朱振武、袁俊卿,2019:144)。我先提出了『三大流散』理論,把非洲文學分成三大類,並在此基礎上提出第四大流散理論即異邦本土流散理論,後來簡稱『賓土流散』(Been-to)理論。特別是西非有很多比較年輕的作家,在歐美發達國家流散後回到他們的母國繼續進行創作,他們會發現一個重要的問題,在歐美流散的時候他們處於異邦文化的沖突之中,回到母國後仍然處在文化的沖突之中。所以這種賓土流散不同於其他三大流散,是一個特殊的現象,亦是非洲文學一個重要的流派。四大流散理論一個很重要的意義和價值就在於,它可以適用於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加勒比、印度等所有被殖民過的或被侵占過的國家和地區的文學觀照,我們可以從這四個方面去研究這些地方的文學肇始、審美形態、創作特點等。

2021年,我在《中國社會科學》中文版發表長文《非洲文學與文明多樣性》,隨後又在《中國社會科學》英文版同步發表論文,題為『The Africanness of African Literatures and New Patterns in Human Civilization』,專門探討非洲文學問題,並提出了中國非洲文學學的『非洲性理論』,呼籲『文學文化共同體』的創立(Zhu Zhenwu, Li Dan, et al., 2022:118)。非洲性,簡單來說指的是非洲及非裔人民對源自非洲大陸歷史文化的深層認同和對那片故土的深層依戀,是其秉持自我、消弭隔閡、牢記歷史但又眼望前方的文化特質。非洲文學的非洲性正是基於這種文化共同體認同的書寫表征。具備了非洲性的文學那就是非洲文學,即使非洲文學作為這樣大體量的一個文學存在,但世界文學此前多少是忽略的,因為它基本上只把獲過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及其作品選入了世界文學。實際上,整個非洲文學基本被忽略掉了,亞洲文學除了印度和日本也基本置之門外,中國文學更不在考量之內,基本上世界文學裏沒有中國文學,所以這算不上真正的『世界文學』。

如此一來,我們便可把世界文學很清晰地劃分出一個所謂的『非主流』文學,作為獨立的一大文學流派。早在200多年前,歐洲殖民者在全世界殖民之後,造成了這樣一種大規模文化『徙移』現象。『徙移』這個詞本來指的是河流改道,常見於古代文獻或者楚辭這類的文獻之中。那我把它用來指什麼呢?因為河流改道正是文化發生了變遷,發生了『徙移』。我們不難發現,世界文學裏的一大支流就是流散文學,在這個理論視角下整個非洲文學都是流散文學,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加勒比、愛爾蘭、印度等也無一例外,進而我們可以觀照流散文學的流散表征、特殊的價值觀和審美判斷。

鄒:如今,構建中非命運共同體和世界文化多樣性的呼聲愈發高漲,您認為當代中國學者應該秉持何種文化態度、文學精神、文化自覺以及文化自信去建立和重構中非文學文化之間的『默契與對話』?

朱:這個問題很有意義。我國學者需與來自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操持不同語言且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學者展開深度且默契的學術對話。這樣的對話應摒棄大國沙文主義傾向,既不應仰視他國學術成果,也不應輕視其他文化,而需秉持平等視角。我在《外國文學研究》2025年第一期發表的《中外文學的傳播互鑒與歸異平衡——以『中國非洲文學學』的建構理路為中心》中也有闡述,我們要建立自信,樹立自我,轉益多師自成師(朱振武,2025:52)。在中國立場的學術共同體中,與西方學者、第三世界學者和非洲本土學者共同尋求合理的對話途徑和跨文化機製。因此,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需建立在獨立自主、自強自信且自覺自省的基礎之上,並非與其他學術體系分庭抗禮,而是要通過此舉進一步豐富世界文學文化的多樣性。

事實上,近年來中國學者在學術研究領域成果斐然。僅翻譯理論方面,我國學者就已提出數十種,文化研究理論亦成果豐碩。諸多理論在國際上產生了重要影響,受到非洲等地學者的廣泛關注與應用。例如,國際核心期刊ANQ(A & HCI)在今年第四輯推出專欄,名為『A New Reading of Literature』,專門刊登中國學者關於非洲文學的學術成果,這是前所未有的學術新象。同時,《中國比較文學》《外國文學研究》《外國文



學》《外國語文研究》等一系列學術期刊也紛紛開設專欄,刊發非洲文學研究最新成果。由此可見,中國學者在理論建構和自主知識體系建設方面已開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不僅具備了學術自覺,且已取得了一定的實踐成果。非洲性的文化寓意告訴我們,一定要構建文化共同體,實現真正的文明互鑒;非洲性的文學書寫告訴我們,一定要構建文學共同體,形成真正的世界文學;非洲性的社會實踐告訴我們,一定要構建生態共同體,秉持可持續發展理念。非洲文學的非洲性還告訴我們,要以意識形態對話取代意識形態對立,以文明互鑒取代軍事占領或冷戰,以文化多極和多樣性取代文化單極、單一與單向性,以命運共同體取代我行我素、故步自封、任性而為和各自為政(朱振武、李丹,2022:64)。

鄒:鑒於中非文學文化交流在某些方面受到歷史和現實的雙重製約,您曾提出一個非常巧妙的詞『他者』,即中國、非洲、西方世界三者之間形成了一個『他者』的三角。請問,如何利用非洲文學形成的『他者』來規避文學交流輕易陷入新殖民主義與種族主義的話語陷阱?如何有效實現中非文學交流的渠道和內容完全自主,實現文學間的相互體認?

朱:這個問題提得非常好!若要切實達成中非文學交流的有效性,就絕不能陷入大國沙文主義。我們不應以帶有偏見的視角去審視非洲的文學文化,避免陷入認為自身一切皆為最優,或認定非洲文學文化不夠文明的誤區。我們應採用田野調查的方法,始終堅守文學與文化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摒棄文化有高低優劣之分的觀念。從這樣的視角進行觀察,有助於我們在審視加勒比文化以及各大洲文化,特別是全球南方文學文化時,擺脫長期以來形成的認知模式,即過度依賴歐美觀點,僅依據英文、法文、德文乃至俄文材料中的論述來構建認知。中非交流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結構性誤讀,這種做法會使我們陷入『輾轉體認』,我在《文史哲》2022年第六期刊發的《中非文學的交流誤區與發展願景——關於〈雷雨〉在尼日利亞的歸化改編》(朱振武,2022:140)中也探討了這一問題。世界上眾多國家和地區對文學文化的了解與認知,是通過輾轉歐美渠道而獲得的,這顯然是錯誤的。此種做法無異於拾人牙慧,因此我們必須規避此類問題。

鄒:一直以來,『世界文學』本質上仍是西方中心主義的產物。我們應該如何打破這種西方中心敘事『怪象』?如何摒棄這種仰視或俯視的思維定式?

朱:該問題饒有趣味,原因何在?自200多年前歌德首次提出『世界文學』的概念以來,眾多後來接觸過世界文學的群體多為西方人。由於東方人及全球南方地區在國際學術話語體系中缺乏話語權,故而在該領域往往處於被動接受的狀態。當下,許多組織與學校所使用的世界文學教材,實則多為對西方文獻的翻譯與編譯。經考察可知,所謂的『世界文學』,實則以英美、歐美文學為主導,僅少量納入亞洲的印度、日本文學,以及其他地區或國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幾位作家的作品,諸如諾頓文學選集等便呈現出此類特征。牛津大學所構建的世界文學體系亦體現出類似的局限性。

從地域與文化維度審視,非洲地域廣袤,面積達3000多萬平方公里,中國擁有5000多年的文學文化史。然而,在現有的世界文學格局中,中國文學與非洲文學基本處於邊緣地位,甚至被忽視。在此情形下,這種所謂的『世界文學』顯然有失偏頗,難以真正涵蓋全球多元的文學風貌,實則是西方中心敘事下的產物,是一種畸形的文學概念。鑒於此,重新繪製世界文學新版圖成為亟待解決的重要課題。對於翻譯界而言,我們不應局限於翻譯英美、歐美地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布克獎、龔古爾獎等知名獎項的作品,以及暢銷文學作品。翻譯工作者應具備自主選擇意識,甄選那些既契合中國讀者閱讀需求,又能體現世界文學多樣性,在敘事與審美層面達到較高水準,且蘊含積極價值觀的文學作品進行翻譯。

二、實踐分享:關於翻譯實踐與經典案例的『得與失』

鄒:朱教授,在您多年的翻譯生涯中,應該說與美國作家丹·布朗的交情最深,合作最多,成效最佳,

《達·芬奇密碼》《數字城堡》《天使與魔鬼》《騙局》《失落的秘符》等都是耳熟能詳的佳作。您曾面對採訪時自我打趣說：『譯了一部「密碼」，掉了多少頭髮；譯了一部城堡「城堡」，少睡多少好覺；譯了一部「魔鬼」，平添多少皺紋；譯了一部「破解」，累得差點吐血。』（朱振武，2023：118）面對如此龐大翻譯量，您能談談您整體的翻譯思想、翻譯認知、翻譯標準嗎？

朱：如此龐大的翻譯工作量本身就極具挑戰性，若要達成『信達雅』的翻譯標準，更是難上加難。要使翻譯成果既能夠為讀者所接受，又能讓出版社與原作者感到滿意，並非易事。然而，普通讀者往往難以理解翻譯家在此過程中所付出的大量心血，翻譯家無法向普通讀者詳盡講述其工作細節，這是客觀存在的困境。我們可以看到，部分翻譯家在網絡上遭受無端指責，實則頗為委屈。他們所從事的翻譯工作往往具有不可替代性，即便個別句子在修辭手法運用上略有過度之嫌，但我們不能因長江中存在幾粒沙子，就否定長江的磅礴與偉大。文學翻譯的靈性問題、再創造問題、文本外因素和化學反應問題，都不是輕易能夠說明白的，文學翻譯一如文學創作，本來就不是科學，而是真正的藝術，可見翻譯家的工作殊為不易。

曾有人致電於我，要求在丹·布朗下一部作品的翻譯中為其署名，否則便要在網絡上對我進行詆毀，但署名與否並非我個人能夠隨意決定之事。因為對方並未為翻譯工作付出實際勞動，我實在難以理解其要求署名的緣由。為何會出現此類現象？事實上，有少部分人秉持這樣的觀點，即署名可帶來聲譽，甚至有可能獲取經濟利益，這種情形較為普遍。當然，我本人性格豁達，對此類事件並不十分介懷，但有些人卻會因此陷入困境。他們可能會惡語中傷、肆意指責，還會刻意尋覓所謂的瑕疵以發起攻擊。我對此並不在意，因為我既從事翻譯教學，又做翻譯實踐，還做翻譯研究，深知其中的難度，一般人難以理解也在情理之中。實際上，相當一部分人所做的工作本質上是『中譯中』，正如著名翻譯家、四川大學曹明倫教授所說，許多人在進行翻譯時並未查看原文，而是參照中文譯本進行所謂的『翻譯』，依據中文內容進行創作，並未接觸外語文本。於我而言，真正得到讀者的認可才是關鍵。以《達·芬奇密碼》中譯本為例，自出版至今已有 21 年，在中國引發了多次大規模的閱讀熱潮與創作風潮，依然擁有眾多讀者。從廣泛的社會反饋來看，無論身處何地，外界對於該作品的閱讀感受多呈積極正面，此現象已成為文學界的普遍認知，無需與缺乏文學素養之人進行無謂爭辯。

鄒：您能就丹·布朗的作品談談譯者要如何捕捉和再現原著的風格嗎？您認為在實際教學中這是老師可教、學生能悟的嗎？

朱：我在教授英美文學或外國文學課程時，所選用的作品皆具有代表性。不同學生對作品的領悟能力存在顯著差異，博士生、碩士生乃至本科生中，部分學生能夠迅速領會作品精髓，而另一部分學生的領悟速度則相對遲緩。翻譯能力的培養亦是如此，不同個體對翻譯作品的感知程度參差不齊，部分人能敏銳捕捉其中的精妙之處，而另一些人則難以產生共鳴。由此可見，個體在文學感知能力方面存在明顯的層次差異，有些人對文學形式高度敏感，而另一些人則在音樂或其他領域展現出較強的感知能力。因此，對文學性或翻譯缺乏敏感度實屬正常現象。在教學過程中，雖然翻譯能力與文學素養具有一定的可教性，但學生自身的天賦與潛力是關鍵因素。若學生缺乏相應的資質與興趣，教學工作可能難以取得理想效果。故而，對於這一問題應根據具體情況進行分析與處理。

鄒：《達·芬奇密碼》入選『改革開放 30 年最具影響力的 300 本書』，其銷量經久不衰的最核心原因是什麼？能否從中國讀者閱讀習慣視角談談？翻譯過程中不乏大量關於建築學、藝術學、符號學、軍事科學等領域的專業術語和專門知識。面對這些翻譯難題，您對原著整體的處理策略和技巧是什麼？

朱：《達·芬奇密碼》系列作為丹·布朗創作的文化懸疑小說，在中國已暢銷多年，其中文譯本的成功不言而喻。通常情況下，當外國文學作品在中國暢銷時，我們往往較少考慮中文翻譯這一因素。事實上，翻譯因素起著關鍵作用。每次翻譯完丹·布朗的作品全文後，我就會去找對應領域的專家來把關，確保理解準



確,且不说外行話。許多作品在中國未能暢銷,很大程度上與翻譯質量相關。原著暢銷並不意味著其在中國市場必然暢銷,這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我曾做過兩個系列講座,一個是關於其作品的翻譯的講座,另一個就是關於其作品與中國小說的創作傳統、閱讀傳統及當下的文化消費理念暗合的講座。丹·布朗的書在中國暢銷二十載,翻譯是重要因素,但另一個因素就是這些書摒棄了後現代派小說晦澀難懂的特征,也未沿襲現代派文學諸如意識流、蒙太奇等創作手法,暗合了中國的小說傳統及審美習慣。新而奇的故事傳統、娛人自娛的傳統、知識傳統和教育諷喻傳統,都是中國小說的向有傳統,也是中國讀者的閱讀傳統,而丹·布朗的小說與這些傳統恰相吻合。而部分外國小說缺乏這些傳統,或不太符合中國讀者的閱讀習慣,即便在英美、歐美地區廣受歡迎,引入中國後也僅能作為研究範本或用於其他用途。

鄒:業界經常流傳著一句話:『翻譯沒有標準答案,是一門缺憾的藝術。』您是如何看待『翻譯標準』和『標準翻譯』這兩組概念的區別?您作為我國的資深翻譯家和文學創作者,您心中的『翻譯標準』是怎樣的?

朱:翻譯就像房屋裝修,是一門缺憾的藝術。即『詩無達詁』,指的是一首詩或一個文本並不存在固定的闡釋標準,亦無固定的中心主旨。若像中學時代那樣通過歸納中心思想與段落大意來對文本進行概括,那麼該文本便難以成為經典。因為以寥寥數語概括其內容,會使文本在不同時代、不同語境下所產生的意義喪失,如此便不能稱之為經典。翻譯亦是『譯無定法』,並無一成不變的規則,那麼翻譯是否存在標準呢?若存在翻譯標準,我想這『三個硬道理』便可間接體現。其一應契合原文語義,其二應滿足讀者的閱讀審美需求,其三盡量忠實原文。然而,標準翻譯實則並不存在。一方面『譯無定法』,另一方面翻譯會因讀者、時代、語言等因素而有所不同,故而不可能存在標準翻譯。翻譯理論能夠助力譯者拓展翻譯視野、提升翻譯認知,但並非用於指導譯者具體的翻譯實踐,因此在這方面我們務必加以區分。

鄒:您曾說過:『好的作家遇上好的翻譯家,那是難得的「艷遇」』。那麼,在作者中心、文本中心和讀者中心之間,您更傾向於哪一種?或者說您更偏向歸化還是異化?

朱:在文本中心與讀者中心之間,需探尋一個平衡點。若譯文僅以文本為中心,而未考慮讀者因素,那麼該譯文便失去了實際意義。反之,若完全摒棄源語言文本,單純為迎合讀者需求,則無異於自行創作。因此,必須在二者之間構建一種有機的平衡關係,這便是我多年來反復論證的『歸異平衡理論』。文學傳播從來不應是單向的,而應該是雙向流動和交流互鑒的;不應是區分主流和非主流的,而應該是尊重和體現多樣性的。相關文學研究也就不應是對某一方的頂禮膜拜式或對某國理論的照搬套用式或跟風隨大流式,而應該是立足各自本土、尊重文化差異性和民族性,充分展現自主性的互動互鑒式;其相關翻譯活動則不應是居高臨下的俯視式,也不應該是降尊紆貴的仰視式,而應該是充分尊重源語讀者文學文化和目標語讀者文學文化的、在歸化和異化之間尋找最佳契合點的歸異平衡式(朱振武,2025:50)。總之,包括漢語學家和中國翻譯家在內的專業人士,多年來實則都在致力於探尋文本中心與讀者中心之間的有機融合。

鄒:在譯文創作和出版發行過程中,是否遭遇過來自『第三方』的困擾?比如譯作在出版後被高仿或被剽竊甚至是出版前被盜竊的情況,您是如何看待以及如何化解『版權危機』的?

朱:我確實遇到過,且此類情況屢有發生。其一為署名騷擾問題,部分人員通過電話等方式,以各種理由要求我給他署名。其二是盜版現象猖獗,盜版行為的嚴重程度令人咋舌。以翻譯丹·布朗的第四部長篇小說 *Deception Point* 為例,當時計劃將其譯為《圈套》,然而在我方翻譯進度尚不足一半時,市場上已出現偽冒的《圈套》出版物。經查看發現,該偽冒版本刪去了原文中具有文學性的內容,僅保留了故事性情節。實際上,這不能簡單視為盜版行為,因為侵權方並非直接盜用我方譯稿,而是自行印刷並冒用譯者姓名、出版社信息、編輯信息以及譯前序等。鑒於此,為避免混淆,只能將該作品出版時的名稱改為《騙局》。此類事件並非個例,如第五部長篇小說《失落的秘符》(*The Lost Symbol*)一書的多個語種版本包括英文原版在全球同步上市期間,中文宣傳名稱為《丟失的符號》,正式出版時則定名為《失落的秘符》,導致《丟失的符號》相關

宣傳作廢。為防止盜版,出版社採用了高科技防偽手段,但版權問題所造成的損失不容忽視,在法律層面仍需進一步完善。目前,譯者或作者追究盜版責任面臨較高成本,且在追究過程中難以獲取足夠證據以獲得法律支持。

鄒:您在翻譯《達·芬奇密碼》時曾表達過一個觀點:文學翻譯的譯者和原作者最好能夠在出身、年齡、教育背景、工作經歷和興趣愛好等方面具有相似性,這樣才能產生美國翻譯理論家尤金·奈達所說的『翻譯對等』的作品。請問譯者和原作者之間的這種『相似性』是否為『做好翻譯』的必要前提條件,是否通用於法律翻譯、科技翻譯等領域?

朱:『相似性理論』是我於2006年完成丹·布朗前四部長篇小說翻譯後提出的核心概念,即格式塔意象的相似性、審美視角的相似性和審美理念的相似性(朱振武,2006:27)。我認為中國文學文化與英語文學文化存在較大差異,中英文在思維方式、表達方式和審美習慣上均有所不同,若一味追求所謂的對等易陷入機械對等或僵化的困境。相似性是文學翻譯的審美旨歸,文學翻譯就應該最大程度追求相似性。我們一定要摒棄那種引進外國文學時要絕對忠實原文,而文學走出去時就定要削足適履一味迎合目標語的做法。我要強調的是,相似性理論及歸異平衡理論並不適用於法律翻譯、科技翻譯等領域。這些理論是基於文學翻譯提出的,但社會科學類翻譯可作參考。

三、未來展望:關於學科發展與時代機遇的『破與立』

鄒:您如何看待人工智能翻譯的迅猛發展?您能談談人工智能在文學翻譯領域的局限性和不可取性嗎?您認為在翻譯教學或實踐中應該如何讓人工智能為我們的文學文化翻譯工作賦能?

朱:在AI賦能的背景下,外語人的作用反而更加凸顯,在傳播新質知識和思想、中國文化的對外傳播和中國故事的對外講述方面,有許多事情等著外語人去做,人工譯者的主體性更應加強。不可否認,人工智能已經能做不少翻譯工作,但我看來它始終都無法取代文學翻譯,這也是譯界公認的。近年參賽譯文給我的總體印象是ChatGPT因素太過明顯,但有『八大缺少』:

中規中矩,缺少亮色。
譯法雷同,缺少個性。
詞語單調,缺少鮮活。
典故不懂,缺少血肉。
修辭不識,缺少錘煉。
語氣不辨,缺少關鍵。
意向不解,缺少文化。
意境不通,缺少生命。

在文學翻譯和高层人文工作面前,人工智能明显捉襟見肘,漏洞百出。作為譯者,明明可以成為人間獨一款,為何偏偏要上流水線?我的觀點是就文學翻譯而言,人工智能翻譯至少面臨『三座大山』:無法思考意識形態問題、無法擺脫單一平庸翻譯、無法創造靈性翻譯。ChatGPT抑或當下備受青睞的DeepSeek,都無法有效翻譯其中的典故、意象、意境、韻律、節奏、語氣、風格以及諸多修辭手法和特殊表達形式,阻礙了個性,阻礙了想象力,使譯文陷入了平庸。文學翻譯家始終都是必要的,不會失業,不會被取代,優秀的翻譯家更



是如此。『詩無達詁、譯無定法』,真正好的個性化翻譯人工智能做不到。尤其是詩歌翻譯,切忌用單一的標準去考量和束縛詩歌的翻譯,而應調動譯者的積極性、能動性和靈性,鼓勵、接受和理解不同的詩歌譯本。

鄒:鑒於此,您認為新時代翻譯學科的培養目標和翻譯人才的努力方向應該何去何從?

朱:在我看來,翻譯學科應該是一門人文藝術學科,也是需要創造力和想象力的學科,是應該融入新質生產力的學科,也應該是更具創新力和創造力的複合學科。以立足本土、服務社會實踐為主要宗旨,以新質生產力特別是人工智能等新媒體新技術為輔助學習手段,以雙語文史哲和美學等博雅通識為基礎課程,以雙語文學文化閱讀、寫作和翻譯為主要修習內容,以思辨能力和家國情懷為主要教育導向,以獻身文化共同體和文明互鑒為最終努力目標,培養能夠進行雙語乃至多語文學文化等各類語言材料自如逐譯和自覺轉換的跨學科專門人才。翻譯學科的課程應該是有較高起點的中外雙語或多語種訓練,中外文學文化系統閱讀和寫作訓練,也就是基於雙語的大量的閱讀和寫作訓練課程為骨幹的課程。

中國學科發展與文學批評需秉持自我意識,青年學者要敢於實現突破,具備廣闊的學術視野、跨學科的知識底蘊、行為習慣與專業能力,以高度的創新意識與嚴謹的學術態度開展科研和翻譯工作,確立自身的學術價值與不可替代性。最後,我想以兩句話結束訪談並與大家共勉:

文學翻譯難自知,何需跟風辨雄雌。

教學相長捧心對,吐氣揚眉終有時。

文學是永恒的,翻譯家是永恒的,文學翻譯和翻譯文學是永恒的,因為閱讀及閱讀的主體,也就是人類,是永恒的!

鄒:再次向您致以誠摯的謝意,朱教授!感謝您撥冗對上述采訪問題進行耐心、深入且細致地解答。

注釋

- ① ZHU Zhenwu, LI Dan & SHAO Yanan. (2022). The Africanness of African Literatures and New Patterns in Human Civilization.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43(3): 113-127.
- ② 朱振武:《〈達·芬奇密碼〉暢銷二十年引發的隨想》,《文學自由談》,2023年第1期,頁118-128。
- ③ 朱振武:《非洲諾獎作家的非洲性和區域性》,《外國語文研究》,2022年第8期,頁10-13。
- ④ 朱振武:《非洲英語文學的源與流》,《中國出版》,2020年第7期,頁73。
- ⑤ 朱振武:《相似性:文學翻譯的審美旨歸——從丹·布朗小說的翻譯實踐看美學理念與翻譯思維的互動》,《中國翻譯》,2006年第27期,頁27-32。
- ⑥ 朱振武:《中非文學的交流誤區與發展願景——關於〈雷雨〉在尼日利亞的歸化改編》,《文史哲》,2022年第6期,頁138-149+165。
- ⑦ 朱振武:《中外文學的傳播互鑒與歸異平衡——以『中國非洲文學學』的建構理路為中心》,《外國文學研究》,2025年第47期,頁50-58。
- ⑧ 朱振武,李丹:《非洲文學與人類文明多樣性》,《社會科學文摘》,2022年第11期,頁63-65。
- ⑨ 朱振武,袁俊卿:《流散文學的時代表征及其世界意義——以非洲英語文學為例》,《中國社會科學》,2019年第7期,頁135-158+207。
- ⑩ 朱振武,張秀麗:多麗絲·萊辛:《否定中前行》,《當代外國文學》,2008年第2期,頁96-103。

(Editors: LI Ruobing & JIANG Qing)